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十五

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中国新闻史

方晓红◎编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13044625

G219.29-43

03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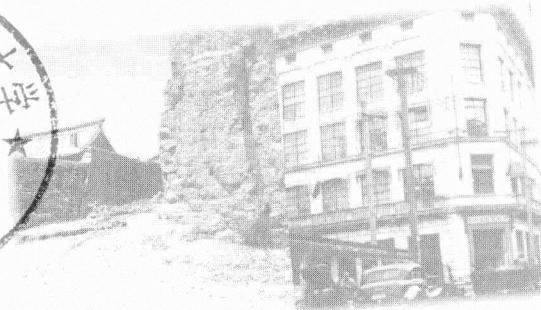
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中国新闻史

方晓红◎编 著



G219.29-43
03



北航

C165219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史 / 方晓红编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3-15901-7

I. ①中… II. ①方… III. ①新闻事业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6644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ZHONGGUO XINWENSHI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 mm × 230 mm

印 张：16.75

字 数：31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策划编辑：王 强 责任编辑：王 强

美术编辑：毛 佳 装帧设计：毛 佳

责任校对：李 菁 责任印制：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新闻传播的产生与演进	1
第一节 古代新闻传播活动	1
一、人类传播与人类共生	1
二、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传播形式	2
三、新闻传播的产生	4
第二节 邸 报	6
一、邸报是中国古代官报的通称	6
二、邸报在各个时代的发展	8
三、邸报的作用及其意义	11
第三节 民 报	12
一、非法民报——小报	12
二、合法民报——京报	14
阅读材料	16
第二章 近代报刊之始	19
第一节 概 说	19
第二节 外国传教士来华办报	20
一、马礼逊、米怜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21
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5, 1837—1838)	25
三、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创办的其他中文报刊	26
四、《万国公报》(1868—1883, 1889—1907)	27
五、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创办的其他中文报刊	29
第三节 在华外商报刊	29
一、外文商业报刊	30
二、中文商业报刊	32
阅读材料	38

第三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办报高潮的兴起	43
第一节 国人对报刊功能的思考与早期的办报活动	43
一、国人对近代报刊功能的思考	43
二、《昭文新报》、《香港中外新报》及《香港华字日报》	45
三、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	45
第二节 政论报刊与维新变法运动	48
一、政论报刊的勃兴与维新运动	48
二、维新时期报刊的倡导者康有为与《中外纪闻》、《强学报》	49
三、梁启超与维新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机关报——《时务报》	50
四、湖南维新派的第一个刊物——《湘学新报》	52
五、湖南维新运动高涨的产物——《湘报》	53
六、北方舆论界的“一枝独秀”——《国闻报》及最早发表《天演论》的《国闻汇编》	55
第三节 维新派在港澳及海外的报刊活动	57
一、《知新报》	58
二、梁启超与《清议报》	58
三、梁启超与《新民丛报》	59
四、本阶段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59
阅读材料	61
第四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新闻事业	65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发展与《中国日报》	65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发展	65
二、孙中山、陈少白与第一份革命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66
第二节 上海等地区的革命报刊	68
一、《苏报》与“苏报案”	68
二、继“苏报案”之后的革命报刊	70
三、于右任创办的四份革命报刊	71
四、国内革命派报刊的另一个中心——武汉	74
第三节 《大公报》与《时报》	75
一、英敛之与《大公报》	75

二、狄楚青与《时报》	76
第四节 海外的革命报刊	78
一、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78
二、《民报》最主要的政论作者章太炎	79
三、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	79
第五节 报刊出版法律的制定	81
阅读材料	82
第五章 民国初期的新闻事业	88
第一节 袁世凯统治时期的新闻事业	88
一、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期	88
二、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摧残	91
第二节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的新闻事业	96
一、袁世凯时期新闻阴暗低谷的绵延	96
二、民国初年新闻业务的变化	97
第三节 民国初期新闻界第一批著名的专业新闻记者	98
一、“报界之奇才”黄远生	99
二、新闻界之全才邵飘萍	101
三、民国初期其他有影响的新闻记者	104
阅读材料	105
第六章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110
第一节 《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标志	110
一、《新青年》及其创办者陈独秀	110
二、《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111
三、李大钊与《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113
第二节 《每周评论》及五四时期的学生报刊	114
一、《每周评论》	114
二、五四时期的革命学生报刊	117
第三节 无产阶级新型报刊的诞生	119
一、《新青年》改组	120
二、《共产党》月刊	121

三、工人报刊	122
第四节 五四时期新闻业务的发展	123
一、政论在报刊中再现辉煌	123
二、文言变白话，文学革命大获成功	124
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副刊	125
四、通讯社有了较大的发展	127
五、商业性大报呈现向企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128
第五节 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教育	129
一、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129
二、徐宝璜和我国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新闻学》	130
三、邵飘萍与《实际应用新闻学》	132
四、中国最早创办的新闻系	132
阅读材料	133
第七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136
第一节 共产党领导创办的报刊	137
一、工人运动高潮中的工人报刊	137
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先驱》与《中国青年》	139
三、中共中央机关报	142
第二节 国共合作时期的新闻报刊活动	146
一、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报刊	146
二、共产党的各级刊物及《热血日报》	149
第三节 民营大报的企业化发展	152
一、实力雄厚的《申报》	152
二、与《申报》并肩的《新闻报》	154
三、独秀于北方的新纪《大公报》	156
四、异军突起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	160
第四节 中国广播事业的萌芽及新闻教育研究的发展	162
一、中国广播事业的萌芽	162
二、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	164
三、戈公振和《中国报学史》	165

阅读材料	166
第八章 十年内战中的新闻事业	169
第一节 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	170
一、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建立	170
二、国民党多如牛毛的新闻法令与“新生事件”	173
三、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地下报刊	175
四、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新闻活动	177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179
一、红色中华社	179
二、《青年实话》等革命报刊	181
三、中国工农红军出版的《红星》报等军队报刊	183
四、根据地革命报刊的主要特点	184
第三节 “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	185
一、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邹韬奋	186
二、范长江与西北通讯	188
三、民营报纸的发展与报人	189
阅读材料	194
第九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新闻事业	199
第一节 抗战初期国统区的新闻事业	199
一、上海新闻界	199
二、武汉新闻界	201
三、“青记”与“国新社”	203
第二节 国统区新闻界的联合与斗争	204
一、国民党新闻事业的扩张及新闻检查机构的加强	204
二、桂林新闻界	205
三、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	206
第三节 解放区新闻事业的发展	209
一、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的发展	209
二、各根据地报刊的发展	213
三、解放区新闻界的整风改革与《解放日报》改版	215

第四节 沦陷区的新闻界	218
一、日伪新闻业	218
二、沦陷区的爱国报刊	219
三、“孤岛”中的外商报刊	221
阅读材料	222
第十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226
第一节 国统区的新闻事业	226
一、国民党以强权扩张新闻事业	226
二、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新闻事业受到压制	227
三、民营报纸的发展	229
四、国统区发生的数起抗暴事件	230
第二节 解放区的新闻事业	233
一、解放区新闻事业经历了发展、收缩、再发展的过程	233
二、解放区新闻事业的两大宣传	235
第三节 国民党新闻事业在大陆的瓦解	238
一、国民党对新闻事业的摧残与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报刊	238
二、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崩溃	240
第四节 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建立	241
阅读材料	242
中国新闻简史大事年表	246
后记	257

第一章 古代新闻传播的产生与演进

第一节 古代新闻传播活动

一、人类传播与人类共生

传播是什么？传播是一种介质。用施拉姆的话来说，“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①

当我们在人类传播史的领域里提到传播这个概念时，是指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一种对于信息的分享与信息的传递：一次眉目传情，一声用力的呼叫，一次肢体的扭动，都带有特定的信息，当它被另一对象接收，就构成了传播。

处于蒙昧时代的人类，坚韧却也弱小，因此人类是以群居的方式开始生存与发展的，在这种方式中，信息的交流与分享成为必然。所以我们说：人类传播伴随着人类而产生。从考古学家那儿我们了解到，从元谋猿人到北京猿人这一旧石器时代前期，人类的首要文化成就是对于火的运用。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发现了火的功用，传授给他，于是，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支配这种自然力的能力。换言之，对于火的运用成为了群体的主动行为，成为了一种文化。而这其中，对于火的认知及使用，显然是通过传播来扩散的。

1954年，考古学者在山西发掘出一些打磨得形状一致的石球，据考证，它们应当是一种狩猎的工具；1976年，又有1500多个石球在山西北部的许家窑村被发掘出来。（参阅本章附录一）

1500多个被人工打磨出来的石球！显然，这是投入了大量人力的，在当时来说还是一种科技性的劳动成果。我们假设这种石球最初的发明与制作者是个体或少数人——这符合科技发明的规律——那么，由个体的科技发明到群体共享这种成果，由少数人对这一制作技能的掌握到大规模劳动力的投入制作之间，就必然存在着信息的传播。

当然，人类早期的传播所能传递的信息受到空间、时间与感官的限制，信息含量是极有限的。

^① [美]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终于，人类在某一个远古的时空里迈出了巨大的步伐——语言被发明了。人类是怎样产生语言的？这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它的答案早已淹没在史前厚厚的尘埃中，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它的产生与传播的需要密不可分。通过语言，人们可以携带大量的信息，同时将它多方传递，达到共享信息的目的。

伟大的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曾在他的名著《古代社会》中指出：“只要是大陆相连的地方，所有的部落都必将会多多少少共享彼此的进步成果。所有的重大发明都会自行向四方传播。”同时，他还描绘了人类从产生直至今日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中，传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传播的功能，人类才能使自己的智慧结晶成为共享共用的财富，从而日渐发展起来；也正是由于传播的功能，促成了人类社会的形成，人类才得以借助群体的力量，适应并战胜环境，遵从且改造自然，从而由蒙昧时代渐次走向文明时代。

与此同时，人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丰富、完善与复杂化了。就内容来看，它包含了消息、情报、知识、资料、数据等各种信息的传递；就形式来看，也从最初短距离的、面对面的单一方式发展为借助各种媒介的、远距离的多种传送信息的形式。

二、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传播形式

在今天这个被称为“环宇乡村”的地球上，由于信息交流的便利，传播形式是趋向同化的。一个好的或先进的传播形式，很快就会被他人接受和使用。然而早期的人类，其传播形式却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与文化特色。如西欧民族以“一”对“众”的演讲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流传至今，而在中华民族传统的传播形式中，最具影响、传播信息通道最长的则有如下几种。

（一）金石碑刻

金石碑刻是指镌刻在金属青铜器具和石碑或山石上的金文和石刻文字。

金文又称钟鼎铭文，继甲骨文之后盛行于商、周。与小而易损的甲骨文相比，钟鼎文信息量更为集中、信息保存的时间更长。如果说甲骨文的主要目的是记录占卜的结果，那么，钟鼎文的主要作用则是为了传播。起初主要是镌刻在鼎上，以颂扬祖先功德，传之后世。所谓“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祖先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

祖者也。”^①

后来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比之殷商时期，字数增多，如宣王时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个字，内容广泛。例如，召鼎铭文详细记载着一位名叫匱季的小采邑主在荒年时，带着奴隶去抢了一位名叫召的小采邑主的粮食，召投诉于东宫，被东宫判决匱季加倍偿还的事件；利簋铭文记载的是武王伐商的事件，其记载的伐商日辰，与史书所载完全相同，从而成为唯一能证明史书记载的历史文物；大盂鼎铭文、克鼎铭文主要记载的是分封与赏赐；散氏盘铭文则是疆界的契约……凡关涉政治、军事、外交、祭祀、刑罚、诉讼、契约等重大政治事件或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几乎都要铸刻于青铜器上，留传于子孙后代。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上述大多铭文极具新闻的特性。

石刻于秦汉以后取代了金文在传播史上的地位。原因是它不仅具有金文的优势，还具备了金文所没有的取材方便、价值较低、大小随意且便于传播的诸多优点。石刻兴起于秦代。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为秦代“石鼓文”（即在鼓形的石上刻的文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以示强威，服海内’并宣示统一四海的功德”，“出巡郡县凡五次”^②。所到之处，多刻石以扬强秦之威德，如泰山石刻、之罘山石刻、琅琊石刻、碣石山石刻、会稽山石刻等。此后，石刻蔚成风气，应该说与始皇帝对石刻的偏爱不无关系。石刻的功用也渐趋扩大，首先，歌功颂德的对象已不只限于帝王，对于一般人士，如自己的祖先或其他有过功绩的人，也会作石刻以纪念、表彰之；其次，石刻的内容亦已极其广泛、包罗万象，而不再仅仅限于赞颂，如有关于农民起义、自然灾害、平定叛乱、记载工匠罢工、作为地界标志等内容的石刻，有供摹印、校订（如熹平石刻即为朝廷规定的标准五经读本，供人摹印以校正民间抄本的谬误）、查证、流传等作用的经文石刻、书法石刻、历代科考中选进士题名石刻、诗词石刻等。

今天的中华大地，凡名山名胜、寺庙古迹无不存有大量的石刻。金石碑刻为后人保存了极为重要的史料，从而吸引了历代众多的学者对它进行研究，也因此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科——金石学。与此同时，它也为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写经修史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经史，可以说它们是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精神支

^① 《礼记·祭统》。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柱。经有五经与六经之说，相传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纂修，成为儒家的经典。孔子是中国的大教育家，他以讲学的方式传播经学。史载孔子弟子三千，遍布各地，连当时被称为蛮荒之地的吴越一带也有其弟子传人，如江苏常熟至今尚存的言子墓，即孔门弟子言偃之墓。常熟民间一带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周游列国，来到吴国时，想了解一下自己的弟子言偃是否将其学说传播于当地，在离言偃住地尚有二十余里时，孔子见一群小儿裸身在河中玩耍，便去问路，那群小儿随即沉身于水，将小桶置于头上，答：“桶作帽，水作衣，此去尚有二十里。”孔子大喜道：“吴地小儿尚且如此知礼，言偃之功可知矣。”遂掉头而归。这故事本身未必真实，但吴国人言偃学成归国，并在吴地传播中原文化却是有史可考的。儒学至汉代，成为独尊之术，从此在中国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此后历代兴起注经之风，对经书作各种诠释。直至封建王朝结束前，经书及其依附于经学的注经之书一直是学子们必读的教科书，也是科举考试的唯一法定标准书目。讲经及注经亦已成为传播文化学术的主要形式。

“经”是封建社会治国之纲，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史学在中国的地位仅次于经学。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史学的文化。几千年来，从《尚书》开始，到《史记》，到《明史》，到《清史稿》，中国的史学文字记载从未中断。史学既是中国知识文化之源，又是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西方的许多古老历史，以变异——神话——的方式保存在传说与文学中，如罗马史诗中的许多故事。倘无其他的佐证，这些传说与文学等不能被视为史料，因此在新闻传播史上，它们缺少价值与作用。而中国的史学始终以史官们敢于秉笔直书、不媚俗、不媚上的精神贯注其间，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之说，从中也可看出中国史学真实性的价值及其在传播文化中的作用。

三、新闻传播的产生

新闻传播产生之初，是蕴含在人类信息传播中，混沌不分的。正因为此，对于新闻传播究竟起于何时就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与界定。传统的观点是新闻传播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这是因为人类基于生存的需要，必然要进行信息传递，当人类懂得用眼神、用手势、用长短高低不同的声音报警报喜或报忧的时候，已经传递了消息；另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传播活动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活动，传播者必须在具备了清晰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之后才能传递新闻。应该说这两种观点各有道理，因为，今天的新闻传播，的确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求生的本能。但是，正因为

作为动物（包括人类）与生俱来的传递信息（其中大多为最新的信息）的本能以及对这种传递的需求，才使新闻的传播逐渐明晰化，才能从混沌不分的信息传播系统中分离出来，经过发展、完善，最后成为具有特定指向和相对稳定意义的活动。

而这种最初的分离究竟在什么时候？倘若说，是在语言产生之后，那么语言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发展过程。今天我们虽然无法拨开历史的迷雾，重现语言发展的轨迹，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它的产生过程也就是其使用的过程，换言之，它不是产生于某一个点，而是产生于一个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传播与信息传播是混杂在一起的，但决非没有新闻的传播。因此，我们不妨把前者视为对于广义的新闻传播的解释，而把后者看作对于狭义的新闻传播的理解。

从狭义的新闻传播活动来看，古代新闻传播经历过从语言传播到文字传播的发展阶段。

（一）语言传播阶段

在文字产生之前，语言媒介是最活跃、方便、普遍、覆盖面最广的传播形式。它通过口耳相传，以一传十，以十传百，形成舆论。《战国策·燕策》记载的“千金买骨”的故事，正是传播力量所致：古代有一个君主悬赏千金求购千里马，三年不得，后用五百金买下一匹千里马的尸骨，以示其求马心切，此事辗转传于民口，不到一年，就买到了三匹千里马。而郭隗以此劝说燕昭王，强调和企图借重的仍然是传播的作用。正因为语言媒介具有传递信息、表达民意、形成舆论的作用，所以历代王朝都有采风的传统，通过采集传播于民间、出自于民间的歌谣，观民意、察民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得以汇集而成册，流传至今，仰仗的不是文学力量，而是古代王者借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采风制。此外，从汉代直至魏晋时代，都十分重视乡评和清议，因为乡评与清议的传播，形成在野的一种舆论，从而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明君以尊重或宽松的态度待之，而暴君则以钳制术处之，所谓“子产不毁乡校”、“厉王弭谤”（参阅本章附录二）正是记载着古代统治阶级对于舆论的态度的两极，同时它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时语言传播的活跃。至今，语言传播在新闻传播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文字传播阶段

文字的出现，在传播史上竖立了一座里程碑。这一发明使得人们有可能携带信息到比人的声音传得远得多的地方，能“打破身在现场的要求，改变口语

的时空偏向”^①。而且比烽火、狼烟、旗语等更能准确、具体地表达信息的内容。要言之，它延伸了人类语言的输送渠道。同时文字能保存经验、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而不必依靠人的记忆力口耳相传。这一点不仅有利于人类文化的延续，而且非常有利于新闻传播。也正是基于语言和文字的发明，大众传播工具——报纸、杂志——才最终出现。文字传播的新闻最早是手写新闻。中国古代有一种称为“露布”的，即古代军事长官发布战报的手写新闻形式。

露布早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战国就有张仪露布檄楚的事例，但那时的露布是指不封检、公开发布的官文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露布不加封检、公开发布的方式不变，传播的内容主要用于宣传战绩和发布捷报，即具有了军事新闻的性质。

对于露布，《魏书·韩显宗传》中就曾有过记载。唐代封演在他的《封氏闻见录》中也曾有过介绍：“‘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所以名露布者，谓不能封检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板”。（参阅本章附录三）

露布的书写方式及传递形式，能保证其在当时的条件下，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传播，因此，露布可以称得上时效性强、传播广泛的一种新闻传播方式。

后世的农民起义中所使用的揭帖、旗报、牌报等，只是这种手写新闻演变的产物。

手写新闻是文字传播阶段的低级形式，文字传播的高级形式是印刷新闻。这一章所要介绍的古代报纸正是处于文字新闻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逐渐发展的原始报刊。

第二节 邸 报

一、邸报是中国古代官报的通称

（一）邸报：中国古代官报的通称

中国古代报纸的称呼繁多，有“邸报”、“进奏院状”、“状”、“报”、“邸吏状”、“报状”、“条报”、“朝报”、“邸钞”、“阁钞”等等。产生众多名称的原因在于，它们均非报纸本身的名称，只是人们或根据它们的产生地、或根据它们

^① [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19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的内容、或根据它们的形式、或延续惯例等等命名。在这众多的称呼中，最为通行的是邸报，因此，可以说邸报是中国古代官方报纸的通称。

邸报这一称呼的产生，由“邸”而来。所谓“邸”，颜师古为《汉书·文帝纪》中“邸”字作注云：“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可见“邸”是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机关在京城设置的办事处，其作用主要有二：“通奏报，待朝宿也”；“邸”制起源于西汉，《西汉会要》中有明确的记载。

（二）邸报产生的时期

尽管“邸”制的起源非常明了，但对于邸报始于何时，却是长期以来新闻史学界无定论的问题。对于古代报纸的起源看法不一，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因史料不足；二因对现存的史料看法不同。

在古代报纸起源的探讨中，有多种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影响较大：一是自西汉始即有邸报。这种观点在中国首先由新闻学泰斗戈公振提出，当代继承其观点的主要是中国台湾学者，如台湾新闻史学者曾虚白曾云：“研究中国报业史者，从‘邸报’之名称，政府之组织及历史故事中，确认汉代已有‘邸报’。唯汉代印刷术尚未发明，此种邸报只是抄写的新闻信，不能视为复制的新闻纸”^①；一是中国古代报纸最早出现于唐代。持此说的大多为中国大陆学者，如“根据现有的材料，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朝”^②。此说者不同意“汉有邸报”说的原因在于，至今尚无足够的材料证明。

上述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在无新的史料以佐证之前，难以定论。因此，关于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比较妥当的说法应当是：中国古代报纸的产生至迟不晚于唐代。

（三）邸报的内容及其意义

邸报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皇帝的起居言行、皇帝的谕旨

皇帝是封建政权的集中代表，他的手谕、口谕、朝旨、诏旨等固然是邸报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他的身体状况、起居言行等动态也同样被邸报关注并记载。如宋祁《景文集》载：“臣某言：今月八日得进奏院状，圣体康复，已于二月二十三日御延和殿，亲见群臣者。”

^①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64页，台北，三民书局，1983。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 官员的升迁、任免、赏罚

邸报的读者主要是官员以及一些试图跻身仕途的读书人。尽管到后来，其读者群稍有扩大，官员的幕僚、亲友等也能看到邸报，但读者群的主体仍然是官员。因此，有关他们的升迁、任免、赏罚等信息，当然就成为邸报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臣僚的奏、疏

大臣、官僚们上奏朝廷的章奏、疏表等也是邸报的内容之一。大约在宋朝庆历年间，朝廷鼓励各地官吏进言，并决定在邸报上转载、摘录京外各地的章奏，至此，各地官吏的章奏也成为邸报的重要内容。

4. 其他信息

邸报也登载一些军事信息；明代始，也偶尔出现过一些社会新闻类的信息。

军事信息如“日接邸钞，省会失守，传闻贼拨已过雁门，直抵云中地界”^① 社会新闻如李乐《见闻杂记》卷十一：“弘治末，随州应山县女子生鬚，长三寸余，见于邸报。”^②

从邸报产生直至消亡，邸报的内容基本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邸报上所登载的信息来源主体是官方的，因此，它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报纸，但它又不同于官方文件，它对各级官府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同时，它的内容带有新闻性，读者可以从中获知新闻，所以我们将之称为原始形态的报纸，即古代报纸。

二、邸报在各个时代的发展

（一）唐代“进奏院状”与“开元杂报”

唐代开元年间，各地藩王（节度使）均在京师设邸，此时的“邸”，称为上都留后院，后改称为“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唐代邸报此时称为“进奏院状”、“状报”或“邸吏状”等。

进奏院是藩镇与朝廷的联系机构，进奏院的长官即进奏官，这一官员由地方藩镇委派，不受朝廷管辖，随着唐代地方藩镇长官权势的扩大，这些官员在京的权力也日渐增长，他们可以向中央政府查询一些行政事务，如柳宗元在《邠宁进奏院记》中记载，进奏院可以“稽疑于太宰，质政于有司”；可参与朝廷的盛典活动和将京城消息通报给所属地区的行政长官，即“历闻闇，登太

^① 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4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② 转引自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2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